

岭南社科名家文丛

陈锡祺 | 自选集

CHEN XI QI ZI XUAN JI



广东优秀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广东省出版集团

广东人民出版社

陈锡祺 | 自选集

CHEN XI QI ZI XUAN JI



广东优秀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广东省出版集团

广东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陈锡祺自选集/陈锡祺著.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7. 3
(广东优秀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出版基金岭南社科名家文丛)
ISBN 978-7-218-05390-5

I. 陈… II. 陈… III. 中国—近代史—文集
IV. K25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12365 号

责任编辑	柏 峰
封面设计	张力平 吴德灏
版式设计	虹 峰
责任技编	孔洁贞 周 杰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印 刷	肇庆市科建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27
插 页	2
字 数	269 千
版 次	2007 年 3 月第 1 版 200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8-05390-5
定 价	54.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020-83795749)联系调换。

【出版社网址:<http://www.gdpqh.com> 电子邮箱:sales@gdpqh.com

图书营销中心:020-83799710(直销) 83790667 83780104(分销)】

广东优秀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出版基金管理委员会

主 任：林 雄

副主任：蒋 斌 陈俊年 黄尚立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桂科 朱仲南 刘 蔚 李子彪

李夏铭 张小杰 杨以凯 陈海烈

林海华 金炳亮 曾少华 颜泽贤

广东优秀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出版基金评审委员会

主 任：颜泽贤

副主任：梁桂全 蒋述卓 李 萍 王国健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仲兴 王利文 田 丰 叶汝贤

刘少波 张小杰 李恒瑞 李新家

陈长琦 陈海烈 陈鸿宇 苏立功

肖海明 陆家骝 罗必良 金炳亮

唐钰明 黄尚立 扈中平 蔡 禾

廖小健



陈锡祺

江苏盐城人，1912年11月11日生。1936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系。中山大学教授，中国近代史研究专家，对新中国的孙中山研究作出开创性的贡献。主持编辑《林则徐集》、《孙中山全集》（5-8卷），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著有《同盟会成立前的孙中山》等。

出版说明

2004年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省委、省政府贯彻中央精神，随后发出《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决定》。这两份文件极大鼓舞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开启了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新局面。作为贯彻落实两份文件精神的一项重大举措，2005年9月19日，省委、省政府在广州召开的全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工作会议上，隆重颁布奖励1992—2003年度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和2004年度国家和广东省科学技术奖。以省政府的名义奖励优秀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在广东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在这次评奖中专门设置了一项“特别学术成就奖”，18位年逾七旬的优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获此殊荣，他们是：张磊、曾牧野、张江明、王琢、梁钊、夏书章、陈锡祺、蒋相泽、吴宏聪、端木正、李锦全、高齐云、黄天骥、黄德鸿、赵元浩、曾近义、汤在新、桂诗春。这些老专家学者德高望重、成果卓著，在各自专业领域成为学科带头人、领军人物，在国内外有较大的影响。得到这样的荣誉，应该说是众望所归。

就在这次会后不久，省委宣传部主持召开广东优秀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出版基金管理委员会会议，决定编选

18位专家的自选集，由省社科著作出版基金全额资助出版。这就是《岭南社科名家文丛》的由来。这些专家学富五车，著作等身，要以一本书的篇幅，展现其学术生涯中最重要的成就，并不容易。很多专家在多个领域均有所建树，一些专家同时撰写多种体裁的文章，有的还发表过外文论著。因此，我们与专家们达成共识，遵循以下原则编选：（一）每本书的篇幅约25万字，一方面体现精选精编的精神，一方面也使读者买得起。（二）只收论文和少量演讲稿、调查报告，不收中外文专著。（三）只选本人最有专长、最具影响的专业文章，不收其他领域的著述。（四）为保持本原特色、历史轨迹，所有文章原则上不作修改，但注明发表时间和原载报刊。（五）为方便读者阅读，对入选文章进行分篇类辑。（六）每人以第一人称撰写一篇学术自传，以展现其求学历程，总结其治学经验。

18位专家大多年岁已高，有的行动不便，有的卧病在床，但他们都对编选工作极为认真，大部分专家亲自动手编选文集和撰写学术自传，有的专家与出版社的编辑反复商量斟酌，其认真态度、严谨作风，令人敬佩！为了抢时间，赶速度，我们尽量抓紧编选和编辑出版工作，还在第一时间为18位专家拍摄了肖像照片，但还是留下了一些遗憾，高齐云、蒋相泽、端木正三位先生驾鹤西去，没能等到书的出版，我们留下的影像竟成为最后的资料。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原定18种书整套一次性出版，现改为分期分批推出，完成一批推出一批。

广东优秀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出版基金成立于1997年，是省委宣传部领导下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具体运作的一个评审、资助社科著作出版的机构，每一到两年评审一次，每次评出省内专家学者撰著的优秀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十余种。基金成立以来共评审和资助出版著作百余种，其中30多种图书荣获省部级以上各种奖励。这次集中资助出版省政府表彰奖励的18位著名专家的个人自选集，可以说是基金资助出版的一次创新。

丛书以“岭南”冠名亦有寓意所在。因为“岭南”已不仅仅是地域的概念，而且具有文化的意蕴。在当前形势下，岭南文化为我们建设经济强省、文化大省、法治社会、和谐广东，必将注入新的活力。为此，我们组织出版“岭南系列”，包括《岭南博士文丛》、《岭南社科名家文丛》、《岭南文化大讲坛系列》等等，力求打造成为文化大省建设中的一个文化品牌，希望得到社科界和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和参与。

广东优秀哲学社会科学著作
出版基金管理委员会
2007年3月5日

学术自传：我这一生所做的最有意义是为研究孙中山尽过微力

我于1912年11月11日生于江苏省盐城县（今盐城市）。我的祖辈是普通农民，到家父才考取秀才，但马上清朝就废科举了。家父此后就以教育为业，民国后又到南京读法政大学，回到家乡后创办了十余所新式小学和一所职业学校。家父为人方正，不苟取与，很重视对儿女的教育，他曾说，虽食盐粥，子女教育不可辍。各子女亦不负所望，均能兢兢业业，并有所成就。

1926年，家父病逝，年仅42岁。以后两年多，我曾辍学去木行当学徒，直到1929年，大哥从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家里有了新的经济来源，我才得以重返学校，到1932年高中毕业。

在我念高中时，九一八事变爆发，我和很多同学一起，参加了反日示威游行和清查抵制日货运动。暴日的猖獗与政府的软弱，使我们愤怒和痛心。我和同学们都在想：为什么我们的国家备受列强欺侮？怎样才能拯救我们的国家？我能为多灾多难的祖国做些什么？但是，大家都找不到答案。平日，我经常阅读一些爱国、进步的报刊。有一次，我在《生活》杂志上读到邹韬奋的

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引用了李剑农的新著《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对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高度评价及李先生对附录《林觉民与妻书》所加的按语，我就找来李剑农先生的原著细读，开始对中国近代史感兴趣，萌生了学历史的念头。高中毕业时，我同朋友商量选择专业的问题。这位朋友建议我报考历史学系，认为“通过历史去教育青年，去唤醒民众，最有鼓舞作用”。这与我的初衷相同，于是我就报考武汉大学历史系，终被录取。

武汉大学的宗旨是培养“通人”。历史系学生在这里不仅要学习历史学，还要学习政治学、经济学、逻辑学等学科；除了精心研读历史专业书籍外，还要博览群书。我在这里遇到了景仰已久的李剑农先生。他当时是武汉大学历史系的系主任，讲授《政治学》、《中国经济史》、《中国近百年政治史》等几门课。李先生所有的课程都讲得非常好，他的宝庆（湖南邵阳）官话虽不容易听懂，但课程材料丰富，分析细致，杂以亲见亲闻的事实，如叙家常，引人入胜。李先生对辛亥革命，对孙中山怀有极深厚的感情，学生们于不知不觉中受到感染。课余，我与同学们经常到李先生住处请教，他非常平易近人，向我们讲了很多做学问的道理和方法。日后我决定以教授、研究中国近代史为终身的事业，先师李剑农的教诲是重要的因素。武汉大学历史系另一位中国古代史教授吴其昌先生，是王国维、梁启超的高足，学问渊博，讲课极为生动，很有吸引力，我听了他的课以后更加热爱历史学这门学问。我当时也就想到，如果要做教师，就要像李师、吴师那样，在做人、做学问方面都能给学生启发与教益。日后我当了教师，也时时以先师的

教导与实践自励，只是未能达到先师的境界。

1935年12月，即大学毕业前一年，一二·九运动在北平爆发，不久，发展为全国性的学生爱国运动。我与同学们一道积极投入这场运动，当时武汉大学也成立了救国会，而救国会的第一份宣言，就是同学们推举我起草的。

大学毕业后我到江苏镇江中学教书。一年后，抗战爆发。1937年11月，上海失守，我离开镇江到武汉、长沙，几经艰辛，最后到了四川。1938年4月，开始在国立四川中学（后改为国立第二中学）任教；1940年1月到武汉大学（已迁至四川乐山）当助教；1942年先后到金陵大学（迁至成都）和四川大学任教。1946年9月，亦即抗战胜利一年后，回到了南京。从1937年到1946年，我挈妇将雏，经历了九年颠沛流离的生活，饱尝失去家园的痛苦，十分痛恨日本帝国主义，对国民党政府也逐渐失去了信心。1945年8月4日，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宋子文在莫斯科同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个条约包含了一些有损中国主权的内容。我对政府未能在外交上维护国家利益十分失望，于是在一份报纸上的《星期评论》栏目上发表了题为《到了该反省的时候了》一文，痛斥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揭露了社会的黑暗，并对当时苏联领导人的某些做法也表示了不满。因为这篇文章，在解放后我还吃了一些苦头。

在成都任教期间，曾与业师陈恭禄先生（中国近代史专家）以及国际关系史专家王绳祖先生共事，一度同住一宅，同桌用膳，朝夕相处。两位前辈专心治学，态

度严谨，对我这个晚辈有问必答，诲人不倦。我也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做学者、做学问的道理。

当时的成都，除了川大、金大，还有齐鲁、燕京等大学，知名学者云集，各大学图书馆互相开放。生活虽极艰苦，但治学条件却很优裕。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可以到各校图书馆阅读；学者彼此之间交流、请教也蔚成风气。钱穆、徐中舒等前辈，也曾给我很多具体的指点和帮助。当时大后方的知识界对民族前途都很有信心，大家相信抗战一定会胜利，都努力做学问，准备胜利后为国家的教育文化尽自己的力量。

1946年，我调往中山大学历史系。其时任中大校长的王星拱先生，曾任武汉大学校长。武大迁川期间，有两年王校长几乎每天都同我有见面机会，我常就教学等事务向他呈报。他对我比较了解，所以到了中山大学后，就写信邀我到中大任教。当时我是金陵大学的副教授，王校长给我的也是副教授，有人劝我不要去做，说给你提升教授你就去。但陈恭禄先生力主我去，他说老师叫你去你就不要计较，我觉得他说得很对，于是就欣然携家南下，在1946年末到了广州，转眼，我就在中山大学度过了60年。

在1949年以前，“中国近代史”在大学还没有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也没有成为历史系学生的必修课，也没有几个教师视为自己的专业。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我才得以全力投身中国近代史的教学与研究。因为广东是中国近代史揭开第一页的地方，所以，我在50年代，就关注鸦片战争时期广东人民的抗英斗争，我不仅参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而且多次到三元里等地进行实地调

查，后来写成《广东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一书（广东人民出版社1956年出版）。这本书是我学习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最早成果之一，主要是强调了人民群众在反侵略斗争中的作用，但我根据可靠史料，对清朝爱国官员和爱国士绅的作用也作了肯定。对一些不实之说（如称抗英斗争系“平英团”领导），我也与其他学者先后予以指出。20世纪50年代末，我与中山大学中国近代史教研组的同事编辑《林则徐集》，当时正是“大跃进”时期，有人急于求成，要求用“跃进”速度把《林则徐集》编成，作为“献礼”。但我坚决反对，我觉得，做这件事，必须对民族英雄林则徐负责，必须对学术负责，必须经得起后人的推敲，万万不可草率从事。编文集是一件费力费时的事情，无论如何急不来。当时正在“反右倾”、“拔白旗”，如果帽子扣下，后果可大可小。所幸的是我的意见最终得到大家同意。最后《林则徐集》（共五册）编成，60年代初由中华书局出版，为国内外学术界研究林则徐提供了第一部详尽的资料。现在看来，这部文集尚有很多缺憾，但至少没有背离基本的学术规范，因而为三四十年后编辑《林则徐全集》提供了一定基础。

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我的研究工作主要以孙中山的事业和思想作为对象。1949年以前，国民党尽管对孙中山表示崇敬，出版过一些孙中山的文集，一些与孙中山有过交往的国民党人也编辑了有价值的史料（如冯自由的《革命逸史》），但孙中山并未成为真正的学术课题。一些传记、年谱、著作，资料不够充分，差错时有出现，评价上则往往有“神化”孙中山的倾向。我决心

全力去研究孙中山也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1955年，我受学校委派，陪同苏联学者谢宁（写过《孙中山的社会政治观点》、《孙中山的社会政治和哲学观》等书）到翠亨中山故居，当时还有一个在苏联的科学院工作、已经入籍苏联的中国人陪同，因有他当翻译，我同谢宁就可以交谈。谢宁告诉我，苏联将在孙中山90周年诞辰举行大规模的纪念活动，也向我介绍了他自己研究的一些心得。我想到，连外国都如此重视孙中山，我们中国人自己应该做更多的工作。我在以孙中山的名字命名的学校里从事中国近代史教学和研究，研究孙中山更是义不容辞的责任。我回来后即向学校领导报告，建议加强孙中山研究。1956年，全国纪念孙中山诞辰90周年的活动形成热潮，我曾到中山县以及广州的一些机构作有关纪念孙中山的报告。在这一年，我读到了毛泽东的《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由此受到很大的鼓舞和启发，决心要尽快拿出成果。根据当时掌握的史料及已进行的工作，我决定把重点放在孙中山的早期思想与活动上。

1957年春，学校派我到了长沙、武汉、南京、苏州、上海、杭州等地收集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的资料，翠亨孙中山故居纪念馆首任馆长李旭昭也与我同行，他是复旦大学毕业生，原来是一个中学的校长，中山县政府委任他负责故居纪念馆的工作。我们访问了许多追随过孙中山和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老人，如参加过黄花岗起义的黄一欧（黄兴长子），还有耿伯钊、李春萱、熊秉坤、梁钟汉、贺子才、冷遁、汪东等辛亥革命前辈。另外，我们还在南京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南京史料整理处（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以及苏州和杭州文物保管委员会发

现许多珍贵史料，如清政府收买叛徒陈廷威“跟踪缉办”孙中山的“墨领密件”等。在此之前，广州文史馆的馆长胡希明送给我一份孙中山《致郑藻如书》的抄本，估计是郑彼岸先生从他自己收藏的文献中抄录的（后来我才看到刊登这份上书的《濠头月刊》）。这些文物、文献和革命老人的回忆，都成了我撰写《同盟会成立前的孙中山》的新资料。

《同盟会成立前的孙中山》这部小书是在很短时间内写成的，1957年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在这本书中，我把自己几年思考过的一些问题作了归纳。例如，在1949年以前，旧中国的史家往往机械地照抄孙中山的某些自述，称孙中山在19世纪80年代中期就完全确立了“倾覆清廷，创立民国”的思想。我详细分析了孙中山思想产生、发展的历史条件，对比、考证了各种史料和记载，我认为，在这个时候，孙中山反清的目标虽已形成，但“建立民国”的思想还没有确立。从19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正是孙中山革命思想形成的关键阶段。在甲午战争以前，孙中山初步具有了反清的革命思想，而且在实践方面，已在集结同志，联络会党、防营，积极准备武装起义。但准确地说，孙中山的革命是从檀香山创立兴中会开始的。1895年的广州起义，则表示了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已经正式用激烈行动来宣布与清政府决裂。从此，他们“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目标再无更改。要系统和科学地阐明孙中山思想发展的道路，就必须摆脱了解放前那种固定神化模式。该书出版后受到中外学者的重视，认为它是反映五六十年代中国孙中山研究水平的著作之一。

我想，主要是因为这部小书坚持了学术的原则，引用了较多前人没有采用过的重要文献和调查材料，对弄清孙中山早期革命思想和革命活动有价值；不过，用今天眼光看，不足的地方还是很多的。

此后十多年，我曾为学生讲授有关孙中山的课程，指导研究生写作有关孙中山的论文，参与主持《孙中山年谱新编》的编纂工作（该书未公开出版，只印了少量油印本）。但由于当时在文化、教育界已经出现“左”的倾向的影响，我因“专门以资产阶级革命家为研究对象”而受到批判，所以，想进一步研究自然困难重重。到了十年动乱期间，我和很多知识分子一样受到冲击，出了“牛栏”，又进干校，许多宝贵的资料和手稿也因“抄家”和搬迁而遗失。

在20世纪70年代，中山大学决定筹建孙中山纪念馆，在讨论时，有一位校外的领导主张把孙中山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有关活动仅作为序言部分，展出几张图片就行了，而主要反映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帮助下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的活动。我当时刚从“牛栏”出来，属于“借用”人员，但我想到，孙中山领导中国人民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是他对中华民族伟大的贡献，这是客观的历史事实，毛泽东和其他党的领导人在著作、演说中也一再予以肯定。如果认为孙中山只有晚年才值得肯定，与历史真实不符，与毛泽东《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的精神也不符。所以，我在讨论中坦然地把自己的想法讲出来，最后，只反映孙中山晚年的方案最终没有被采纳。在筹建期间，我同胡守为教授受命收集孙中山的资料，准备恢

复孙中山纪念馆。其间曾赴北京与孙夫人宋庆龄联系。孙夫人因为各种原因未能接见我们，但亲笔回答了我们的问题，又为中山大学孙中山纪念馆题写了馆名。

十年动乱结束后，孙中山研究便迎来了春天。1978年，中山大学孙中山纪念馆建立并向观众开放，1979年春，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室成立，这是中国大陆第一个专门研究孙中山的学术机构，1986年升格为研究所。我被任命为孙中山研究室主任，后来由陈胜彝教授接任所长，1991年改由林家有教授接任所长。1979年，“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学术讨论会”在广州举行，这次会议成为我国内地学术界研究孙中山的一个新起点。在孙中山这面旗帜下聚集了我校和广东其他学术机构的一批学者，大家分门别类选择、确定课题，很快就写出了一批水平较高的成果，奠定了广东在孙中山研究这个学术领域中的地位。1978年，中山大学中国近现代史学科点也恢复招收硕士生。此后的短短几年，形成了一支老、中、青年学者组成的研究队伍。1990年中日学术界在中山翠亨合办“孙中山与亚洲国际学术研讨会”，我忝任中方委员长。这次会议有很多台湾来的同行，是海峡两岸学术界第一次研讨孙中山思想与功业的盛会。1986年、1996年纪念孙中山诞辰120、130周年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我都躬逢其盛。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我在学术会议先后结交了很多境外著名的研究孙中山的专家，例如香港的王德昭，台湾的吴相湘，美国的韦慕庭，日本的山口一郎、岛田虔次、野泽丰等，大家尽管以往并不相识，但一说起孙中山就一见如故。2005年10月，野泽丰教授不顾年高体弱，还来中山大学看望我，并为中大